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现代文论史

第4卷 / 丛书主编 王一川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Theory

思想的制序

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取向

胡继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论史

第4卷 / 丛书主编 王一川

思想的制序

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取向

胡继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论史. 第四卷, 思想的制序: 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取向 / 王一川主编; 胡继华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7

ISBN 978-7-303-21144-9

I. ①中… II. ①王… ②胡…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批评史 IV. ①I209.6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ZHONGGUO XIANDAI WENLUNSHI DISIJUAN SIXIANG DE
ZHIXU ZHONGGUO XIANDAI WENLUN DE DUOYUAN QUXIANG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14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0 元

策划编辑: 王则灵

责任编辑: 赵雯婧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段立超 陶 涛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总 序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界，曾先后出现过林林总总的新的文学观念、思想或思潮——它们在这里被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或简称中国现代文论。这些被视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东西与同时期同样新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现代文学作品一道，通过影响诸种不同读者的心灵，而在现代社会革命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现代社会革命进程有力的推动力量。对这样的中国现代文论展开追溯、论析和评价，当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问题在于，今天从事中国现代文论史编撰，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当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已出现过若干种，而它们已从各自不同角度向人们重新打开中国现代文论历程中的多样景致时，现在再来着手编撰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是否有必要？确实，现在来编撰一部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起码前提就在于，必须确保能在中国现代文论史观上或多或少地呈现新东西，至少是有所出新。如此，在文论史观上出新就应是我们中国现代文论史编撰的唯一选择。但是，要在前人和时贤业已倾力创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编撰领域另觅新径，谈何容易？！我们只能勉力为之。

中国现代文论，也可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这里大约是指相互交融而难以分割的四个层面的东西：第一层面是指那些明确表述出来的文学思想或理论，例如梁启超倡导的“诗

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三大文学革命主张；第二层面是指在一定的文艺共同体（由一定数量的作家、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组成）内外标举或响应的那些相互关联的诸种文学思潮，例如，五四时期的“为人生而艺术”潮流、后来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第三层面是指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论著中表述或蕴含的相关文艺或美学观念，例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有关艺术的论述；第四层面是指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或显或隐的文学观念、艺术观念或美学主张等，例如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对湘西边远山乡中纯美情感的追求及其所呈现的深层文学与美学观念。这些层面的文学思想、思潮及观念共同编织成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声部交响曲。

相对而言，本书固然会主要讨论上述第一、第二层面的文学理论，但在需要时也会对第三、第四层面有所涉及。

二

中国现代文论史可以被视为一个包含若干长时段的超长时段连续体。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为第一个长时段，可称为现代Ⅰ时段，而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称为现代Ⅱ时段。本书将主要探讨中国现代文论史的现代Ⅰ时段，至于现代Ⅱ时段状况，则应另行研究。

就具体的时段或时间来说，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论域由三个时段组成：直接的主要论述时期现代Ⅰ时段称为主时段，与此时段存在关联的那些时段为关联时段，而有所延伸的时段为延伸时段。中国现代文论史的主时段为1899年“诗界革命论”（梁启超）提出至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前；其关联时段为鸦片战争至庚子事变；其延伸时段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过，现代Ⅰ时段本身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前后两个中时段：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为现代Ⅰ时段前期，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为现代Ⅰ时段后期。这里将把中国现代文论史的现代Ⅰ时段前期状况作为直接论述对象，但同时也会适当涉及关联时段和延伸时段。

三

这部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中国现代文论史是中国我者（或自我）与外来西方他者之间文化涵濡的结晶。涵濡，是一个中国词语。涵是指包容或包涵，即把外来的东西包容进自身躯体之中；也指沉或潜，即把外来者不仅包容进来，而且还能沉入自身躯体之中，直到潜入最基础的底层。濡则有沾湿或润泽、停留或迟滞及含忍之意。合起来看，涵濡的基本意思在于雨水对事物的包涵和滋润状态。可见，涵濡带有包涵和滋润之意，以及更持久而深入的濡染、熏陶或熏染之意。它可以同现代人类学的“濡化”（acculturation）概念形成中西思想的相互发明之势，共同把握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在 20 世纪实际经历的相互润泽情形。

应当看到，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各自的身份及内涵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史地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段有其不同的呈现方式以及关系状况，正是这种身份及内涵变化会影响到现代文论本身的发展和演变。

同时，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发生关系的社会语境本身也是变化的，正是这种社会语境变化会对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的关系状况及其演变产生根本性影响。

由此，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涵濡会导致中国我者发生微妙而又重要的变化，其结果是，让中国我者既不同于其原有状况，也不是西方他者的简单照搬或复制，而是一种自身前所未有、西方他者也从未有过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现代文论。

正是在如上意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论史是现代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文化涵濡的产物。在中国现代文论界曾先后登上主流地位的“典型”与“意境”范畴，正是一对平常而又重要的范畴实例。应当讲，来自西方的“典型”范畴在西方 20 世纪文论界本身并没有像在中国现代

这样主流过(尽管曾经在苏联文论中主流过);同样,来自中国古代的“意境”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论界本身也没有像在中国现代这样主流过(尽管明清时代曾有人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过)。实际上,它们之所以能盛行于中国现代文论界,恰恰应当归结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文化涵濡或濡化,也属于这两者之间文化涵濡的结晶。就“典型”来说,中国古代以金圣叹小说评点为代表的人物性格理论,已为西方“典型”范畴在中国的涵濡准备了合适的土壤、气候等文化条件,而亟需拯救的中国现代文化危机则成为“典型”登上中国现代文论主流宝座的有力推手。而来自西方的以尼采的“醉境”(或酒神状态)与“梦境”(或日神状态)等为代表的美学理论,以及以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和斯宾格勒的“文化心灵”等为代表的哲学及文化理论,也为中国古代“意境”(或“境界”)理论在现代的复兴及大放异彩提供了强烈的比较发明诱因。尽管在论者因不满足于“典型”的独尊地位而倡导将“意境”作为与之平行的美学范畴提出之初(1957),“意境”概念并没有立即在中国热起来,但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深化,“意境”作为中国文化与艺术在全球化时代当然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标志,而逐渐与“典型”一道成为“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①,乃至后来逐渐成为取代“典型”范畴而一枝独秀的美学范畴。由此看来,无论是人们已经论及的“典型”还是“意境”范畴,或者本书提出的“感兴”范畴,它们之所以能成为或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核心范畴,恰是由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发生了持续的文化涵濡的缘故。如此,要想弄清中国现代文论这对重要范畴的兴衰,假如不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文化涵濡去把握(当然也应当同时从其他方面去把握),想必是难以全面完成的。

① 李泽厚:《“意境”杂谈》,《光明日报》“文化遗产”,1957年6月9日、16日,据李泽厚:《门外集》,138—139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

四

这部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属于笔者担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 200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在结项后的一项延伸和扩展性成果，共由四卷组成，依次由笔者与陈雪虎、胡疆锋、胡继华协力承担。在与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众多同行朋友协力完成该项目的结项成果《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之后，我们再集中大约七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四卷本著作的撰写工作。如此，这部著作的研究、写作及修改过程不知不觉中竟然已前后历时十多年。

这四卷除了第一卷为总论外，其余三卷都大体按照时间进程的推移或交替去安排，第二卷主要停留于清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之间，第三卷聚焦于民国初年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第四卷着眼于五四时期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不过，与此同时，包括第一卷在内各卷的主要议题或任务诚然各不相同，各有侧重点，但它们之间又都存在复杂的关联性及其持续的缠绕，因而相互之间呈现交叉、回溯、照应或打通等态势，又实在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只有这种分工的相对性和交融互通的密切度，才更有利于进入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进程之中。因此，当有的人物、事件、观念、命题或案例在各卷中数度重复出现或交叉，甚至被赋予不同的阐释任务时，都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第一卷为中国现代文论传统。这属于全书的总论部分，概要地阐述中国现代文论若干方面的特征，由本人撰写。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不是来自对西方文论的简单照搬，而是有着自身的现代性缘由。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被视为“世界之中国”时代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持续的层累涵濡进程的产物。置身在持续的层累涵濡过程中的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关系总是具有相对性和变化性，这导致异质他者总是不断地被涵濡进自我的机体中，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中国现

代文论传统可以由其知识型、核心范畴及其位移、我他关系模型及双重品格得到呈现。在心化美学与物化美学的对照及兴辞美学方案中，可见出中国现代美学Ⅰ时段与现代美学Ⅱ时段的分化与联系。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特点还可从与中国现代型文学传统的特征及其大海形象个案的比较中见出。

第二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探究清末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轨迹，由北京师范大学陈雪虎撰写。需要暂且搁置我们后人想当然的清晰概括，重返当时的文论发生现场（假如有的话），尽力窥见其时本来就有的多元选择中的困惑与执着、拒绝与对话、冲突与调和等不同面貌。从知名的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等以及未必知名的朱希祖等人物的选择可见，中国现代文论从其发生赋形时段起就呈现为多元取向中的张力式构造及历时与共时交互缠绕的复杂过程。无论是其顽强守护中国我者固有传统的方略，还是其果敢拿来西方他者的精心筹划，都呈现出多重方案或多种可能性，以及逐渐演变或寻找的复杂性。通过尽可能多地检视当时的不同陈述、查阅新近研究成果、引证时贤多种不同的论说，多方面地贴近中国现代文论发生期的内在的张力状貌和多重选择的困窘，构成该卷的自觉追求和特色。

第三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构型。探讨中国现代文论如何以多层面的体制化方式进一步形塑自身的生存方式并发生演变，该卷由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撰写。该卷的新意在于走出过去单一的思想辨析路径，尝试从学术体制与文论思想之间的关联性视角，也就是从知识制度的大众传媒、现代大学、文学社团、政党文艺政策的综合与交融视角，具体勾勒中国现代文论尽可能完整的制度化转型面貌及其具体的生成与演变轨迹，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论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多层面之间的交汇以及历时与共时之间的交融图景。正是借助于这种综合与交融视角，通过大量的具体案例分析，该卷揭示了中国现代文论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制度化转型状况，表明假如离开这种多层面制度转型，中国现代文论那些已经呈现或尚未完整地呈现的特质就是不可思议的或难以理解的。

第四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取向。分析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文化涵濡与多元文论思想秩序，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撰写。该卷选取精神史与文化涵濡的视角，从纷纭繁复的现代文论观念、命题或思潮中，尽力梳理出几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主张或文艺思想，看看现代耳熟能详的或者暂且被遗忘的那些文艺思想，是如何在当时以自身面貌呈现出来的。人文主义、道德理想主义、社会主义和象征主义正体现出其时的多元思想景观。甚至其中的象征主义思潮内部，还可细分出诸如梁宗岱的象征诗学、李长之的理想人格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心灵”、冯至的浪漫主义、闻一多的古典主义、陈寅恪的史诗互通论和钱钟书的跨文化诗学等不同思想选择。当代人从这些不会被遗忘的多元思想取向及著者自己有关天文与人文汇通和中西诗学互化的构想中，可以得出怎样的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四人合作的四卷本著作，除了各卷承担不同的分析任务，而在人物、思想、事件、社会文化语境及其他相关现象方面有时会略有重叠或交叉外，各位著者在学术上也各有其学术积累、治学专长和文论主张，因此，虽然彼此做过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共同努力，但终究还是各有其特殊性或个性显露。这应当说也是合理的，因为笔者所设想的学术合作，不再是消除个别性或差异性的完全同一，而是带入差异和体现个性的“和而不同”的共同体。不过，在关于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面貌、主线、分期、制度、知识型、核心范畴及品格等主要问题上，各位著者之间的相互协调立场仍然是接近的，尽管难免仍存有不同。



2019年1月22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导 论	1
一、乱云飞渡的“过渡时代”	1
二、从精神史出发探索中国现代文论制序的构型	5
三、文化涵濡与中国现代文论创制	10
四、“血书”、“孤愤”：王国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精神	26
第一章 现代景观下的古典精神	
——“学衡派”与人文主义文论制序	38
引言：过渡时代，两套文化谋划	38
一、革古、复古与变古	42
二、中西涵濡，人文化成——“学衡派”的文化论说	54
三、修辞立诚，由情悟道——“学衡派”的诗学断章	70
四、自律的文学，规训的帝国——梁实秋、闻一多、邓以蛰 的文论体系	96
五、人文中国，审美世界——道德理想主义视野下的文论制序	122
结语：古典的生命，人文的蕴藉	157
第二章 激进启蒙意识的文论制序	
——瞿秋白文论及其时代精神	160
引言：历史的反讽，还是历史的误会？	160
一、二元人格与历史悲情	161
二、启蒙与革命的辩证	166
三、“欧亚华俄，情天如一”——文化设计方案	178

四、浪漫的抒情美学与革命的叙事织体	190
五、言“革命”之志，载“革命”之道——文学的主体	204
六、“现代中国文”——普罗大众的文论制序	217
七、史诗正典——“普罗现实主义”	232
结语：激进启蒙意识的文化符码	241

第三章 文化精神的符号编码

——中国现代象征文论制序	244
引言：从文学到文化	244
一、“象征”与“象征主义”的脉络	246
二、“象征”诗艺及其同象征主义的契合与互动	257
三、象征的诗性之维——梁宗岱的诗艺与比较诗学	268
四、象征的人格之维——李长之文论及其批评	291
五、象征的同情之维——宗白华诗学及其文化精神的审美建构	300
六、象征的浪漫之维——冯至诗艺及其文体建构	325
七、象征的神话之维——闻一多的古典文论探微	337
八、象征的历史之维——陈寅恪“史”“诗”关系论以及其复杂的 隐喻体系	353
九、象征的辞章之维——钱锺书文论与跨文化汇通	375
结语：会通“天文”与“人文”	406

结语：中西互化与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型

一、立国之忧与“三个中国”说	410
二、“境界诗学”的内在裂变	415
三、从“境界诗学”到象征诗学	417
四、方法论与中国现代文论形态的生成	420

后 记

433

导 论

一、乱云飞渡的“过渡时代”

清末民初的历史文化“创局”已经启动了中国现代文论自我塑造的历程。“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学革命”、“美术革命”，大致都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暴戾的东扩进程在诗学、文学和艺术学维度上的投影，这些革命或风云涌动，或润物无声，但无一例外地拓展和加深了历史文化的“创局”。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新变以及现代体验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现代文论在其酝酿过程与发生时刻就显露出多种端倪，预示着多种可能性，展示出多种趋势：摹仿西方体系，回归民族本位，面对生活世界，布施社会教化，养育健全人格，捍卫审美自律……更明确地说，中国现代文论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竞争、杂语共存、异趣沟通的景观，表现出跨越文化涵濡以及建构话语主导权力的渴望。同时，中国知识制度的巨大转型，是与中国历史文化“创局”同等重要的历史文化事件。它通过复制西方知识生产与交流的制度，一方面对正在生成的中国现代文论构成了强制性的语境压力，另一方面又改变了知识共同体的内在构成方式以及知识载体的存在方式。知识制度转型又得到现代传播媒介力量的驱动，让作为知识形态的中国现代文论的传播在速度、幅度与广度上都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可以比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现代文论已经发生，中国现代知识制度的转型不可逆转，中国现代文论制序的构型给中国文化精神增加了新质。本卷所关注的，就是中国现代文论（以文论为主体的现代知

识形式、知识制度和话语体系)的多元并存状况,分析和整合文化涵濡与文论的思想之制序的导向、生成及其定型。“制序”,语出《文心雕龙·宗经》:“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里用“制序”来描述中国现代文论对自身合法性的诉求,对自律制度的型构,对自由秩序的建构,以及对其自身在思想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中的定位。换言之,文论制序,是在道统、政统、学统之中确立文统的地位(详细论述参见以下第三节)。值得特别说明的是:

第一,本卷原名为“文化涵濡与诗学制序”,为保证一套书的体例和架构的整一性,凸显“中国现代文论史”的集体创作特色,在统稿时将书名改为“思想的制序——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取向”。本卷拟从文化涵濡的角度探索中国现代文论的思想制序之渊源、生成、构造、分化以及趋向于整一——“道统”(思想)、“学统”(学术)、政统(政治文化语境)的过程,以及文统(中国现代文化新传统、中国现代文论与批评实践)的构型及其制序化。

第二,在本卷的叙述和论说过程中,“诗学”与“文论”被纳入思想制序之中,而没有做出明确的概念区分,甚至彼此互换,借以凸显思想史论域之中“诗学”和“文论”(含批评实践)的创造性质。“诗学”(pôesie)在创造性意义上涵盖文论,凸显文论的创化特质;“文论”在实践性意义上呈现诗学的生命机制;而贯穿本卷的“文化涵濡”概念则赋予“诗学”和“文论”以文化整体品格以及多元导向与复杂构型。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前期,正是一个孕育着无限生机和巨大潜能的时段。探索思想制序,自然应该聚焦于时代精神,又关注社会思潮,却不能简单地以思想史来取代文论史,而是相反:以思想史研究来展示文论史的隐微与厚度,同时以文论史来赋予思想史以感兴与活力(参见以下第二节的详细论说)。^①

^① 以思想史来代替文学史将令学术研究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恣意阐释思想史(精神史)取代了语文学,预示着学术的衰落。”参见 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Latin Middle Ages*, Trans.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81-382.

我们不妨套用梁启超的历史概念，把这个时段叫作“过渡时代”，一个“希望”和“恐怖”并存的时代：

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其在过渡以前，止于此岸，动机未发，其永静性何时始改，所难料也；其在过渡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勇可贾与否，亦难料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汉江赴海，百十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喬皇。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茶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

抑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青黄不接，则或受之饥；却曲难行，则惟兹狼狈；风利不得泊，得毋灭顶灭鼻之惧；马逸不能止，实惟蹶山蹶堙之忧。摩西之徬徨于广漠，阁龙之漂泛于泰洋，赌万死以博一生，断后路以临前敌，天下险象，宁复过之！且国民全体之过渡，以视个人身世之过渡，其利害之关系，有更重且剧者；所向之鹄若误，或投网以自戕；所导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届。故过渡时代，又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限，而所争间不容发者也。^①

置身于巨大“创局”情境中，梁启超将出离“数千年停顿”而迈向现代的“中国”称为“过渡的中国”，认为过渡时代关系着一个民族的存亡。在他们那一辈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能不能超越“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而成为“世界之中国”，完全取决于中国在这过渡时代能否有所作为了。当隔着百年的流年碎影回望这个过渡时代，我们惊喜地看到中国现代文论将自己的基础建立在中国人的现代体验和符号实践的基

^①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梁启超全集》，46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基础上，而对于汹涌的西潮有所反应，对于现代的挑战有所回应，对于自体古典文化的残像余韵更是有所回味。1935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蔡元培，在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的《总序》中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并期待中国人以“奔逸绝尘的猛进”，“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菲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① 蔡元培所憧憬的文化愿景，并非秋天的枝头静静地等待摇落的果实。要将中国文艺复兴的梦想种植在华夏大地，让它生根、开花和结果，实在仰赖于“过渡时代”那些开拓者。如郑振铎所说，那一群担负文艺复兴使命的探索者，“在那样的黑暗的环境里，由寂寞的呼号，到猛烈的迫害的到来，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兴奋与苦斗中生活着”^②。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这些现代文论的探索者呼应20世纪全球文化的多元格局，扎根于中国民族独特的生存方式及其在转型社会的现代体验，反省20世纪初的文学实践，尝试回答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文化的压力、现代中国人的体验、现代中国的文学实践构成了强大的语境压力，冲击着古典和近代的中国诗学理论模式。换言之，文化涵濡直接或者间接地引发了传统文论制序的现代转型，这一转型带来了文论制序的新变与新生。中国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与世界同步的努力，但与世界同步意味着认同欧洲话语的强势逻辑。欧洲文学思想如潮涌动，大有惊涛裂岸之势；欧洲近代文论话语也被广泛猎取，甚至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骨架。西显而中隐，便是现代中国文论制序在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必然，甚至是现代中国知识话语的宿命，且是中国文化在现代的整体转型中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然而，用萨义德的话说，在西方话语“驶入的航程”上，必然出现本位文化的“反抗”，帝国文化建立的历史

①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见刘运峰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② 郑振铎：《〈文学争论集〉导言》，见刘运峰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3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首先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历史和互相重叠的领域，其次是需要进行知识与政治的选择的历史”，帝国文化的主宰与被主宰者的反抗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① 在欧洲文学思想及其知识构型借助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之暴戾东扩而入侵中国古典文论话语体系之时，中国古典文化以或隐或显的方式顽强地实施抵抗。“驶入”与“抵抗”二极互相比力，主导的欧洲话语、残余的古典话语和正在生成的中国现代文论三方角逐，此消彼长，盈虚消息。于是，中国现代文论呈现出“过渡时代”的典型风貌：多元竞争、远缘融构、杂语共存、异趣沟通、古今涵濡，而期待以及预备着一种话语威权的降临。中国现代文论多元归一的趋势隐隐地预存于多元思潮的涌动中。按时间范畴分类，中国现代文论制序建构中有古典余韵型文论、近代意识型文论以及现代体式型文论，它们之间彼此渗透、互相挪用，传承而又对话，冲突而又和解。按空间范畴分类，中国现代文论制序建构中有全盘西化型文论、民族本位型文论、调和折中型文论，它们之间彼此位移、互相转换，对观而又互补，间离而又沟通。按照文学运动分类，中国现代文论制序的建构中有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含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文论（含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文论，它们之间彼此关联、互相包含，误置而又调适，悖立而又汇通。

历史文化经历“创局”，中国现代文论也经历着“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多种思潮汇流，多种声音喧嚣，多种可能性潜伏，多条道路正在敞开……真可谓风起云扬，乱云飞渡，山雨欲来。我们应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回眸和观照“五四”之后三十年中国文化的风云际会，探索中国现代文论制序的构型呢？

二、从精神史出发探索中国现代文论制序的构型

文化历史的“创局”以及在其中生成和发展的现代文论制序，无疑

^① 参见[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37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